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每份售六百元·

第一卷 第十三期

專論

士的使命與理學 張東蓀

民主政治與自由 鄒文海

逆流與歧途 孫克寬

教育

美國教師的貧困 梁甌第

生活與文化

西方人「回到宗教去」的意義 陳衡哲

觀察通信

鮑埃斯談中國遠景（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張含英談黃河河政（蘭州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福哉馬利亞 戴鎦齡

讀者投書

台灣與祖國 汪留照

我們需要再來一次五四運動 于鶴年

紐約來鴻 田莊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宗白華 徐盈 馬寅初 許德珩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胡先驌 馮友蘭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曾昭掄 趙超構 葉公超 劉大杰 錢端升 錢清廉 錢鍾書 戴文賽 戴鎦齡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柳無忌 孫克寬 許君遠 高覺敷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趙家璧 雷海宗 潘光旦 蔡維藩 錢能欣 錢歌川 鮑覺民 戴世光 蕭乾 顧翊羣

·撰稿人·

中孚興業化學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CHUNG FU HSING YEH CHEMICAL PRODUCTS CO., LTD.

本公司係國內規模最大首先自製染料之工廠總廠設上海縣閔行鎮佔地百畝分廠設上海市歸化路以最新式機械製造各種染料紅丹黃丹及其他化學製品等均經國內各大染廠及化學廠採用認爲品質優良實駕乎舶來品之上但本廠乃未敢自滿尙須精益求精以冀挽回漏巵于萬一而副諸君提倡國貨盛意茲將出品項目開列於后：

鐘斧牌 127青光硫化元

鐘斧牌 126青紅光硫化元

鶴牌紅丹

鶴牌黃丹

總公司：上海天津路一九五弄五〇號 電話：九〇一八四

閔廠：上海閔行鎮東

滬廠：上海歸化路三八三號 電話：三六九八七 電報掛號五九一一

專訂

英美書籍雜誌

東亞書社

▲門市部 上海四川路三二一號
電話：一九一三六號

▲總管理處 上海九江路中央大廈一〇四號
電話：一七六一五

大光明內衣公司

出品種類

襯衫 童裝 球衫 學生裝 青年裝

襯褲 工裝 球褲 中山裝 少年裝

總店：金陵東路四一四號 電話八二九六七

一支店：北京西路四七一號成都路西

二支店：四川北路六八七號虬江路北

製造廠：南市老北門晏海弄廿四至廿六號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牯嶺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零售：每册六百元
訂閱：平寄者先付八千元掛號或航寄者先付一萬元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有查詢，請註明定單號碼。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一卷 第十三期
卅五年十一月廿三日

本期作者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鄒文海：暨南大學法學院院長
孫克寬：內政部參事
梁甌第：前大夏大學教授
陳衡哲：前北京大學教授
戴鎦齡：武漢大學教授

士的使命與理學

張東蓀

還是一件怪事：昨天（一九四六、十、三、）忽然接到一包稿件，我打開來一看，乃是我自己的舊作。內中還有致張君勱先生的信。現在把信抄在此，使知此事的原委。『立兄如晤：致家兄與鄧公函已收到。鄧公另有復信。家兄近益衰老，萬難跋涉長途，來書院任事。公來信措詞太露。須知所有信件俱由日憲兵查閱，並拍照留底。小有問題，立即拘捕。惟弟已向此間英美使館說通，以後來往信件均肯代爲攜帶。請公亦向使館交涉，當無不允。須知弟在虎穴中無時不可發生生命危險也。拙作一篇即託彼等攜上。如「再生」不登即送「東方雜誌」爲禱。八、十日遜上』。原來在南京淪陷後，政府移到漢口的時候，我在漢口與君勱先生商談。本有再辦一個書院的計畫。他託我到桂林去看地，以便造屋。迨我到了桂林，白鵬飛先生要請我在廣西大學任課。我以爲燕京大學如能存在，不如在淪陷區多照顧幾個未能入內地的青年爲宜。乃即潛歸北平。後來不久聞知君勱先生的書院居然在大理成立了。果爾又有其親筆來信，約家兄孟劬，友人鄧文如先生陳同燮先生去担任中西歷史。這便是那時我爲書院而作的一篇文章。當時滿以爲寄去了，却不料今天反而寄回來。其中必有曲折，亦不必去追究。就中所言的雖經七年，似乎尚未過時。所以特把他寄給「觀察」。一則聊存鴻爪。二則亦是這個問題還有提出討論的必要。

三十五年十月四日

編者按：右刊附記，原附文後，係編者移刊文前。

一

我對於理學（本又稱道學，後又分出爲心學）另具一番見解。這個見解蓄在心中好幾年了。因爲如果寫了出來必定多參考幾本書取得充分的證據。無如我任課太多，在上課的時候總是不能寫文章。以致心中雖具這個見解，總沒有機會把他寫出來，以求教於當世賢哲。現在友人張君勱先生又要重整書院式的教育，雖不見得完全取法於理學家講學的辦法，然而至少有若干的關聯，因而使我更想把這個意思提出，以貢當代人士的討論。不過現在不是平常時代，作文只能求其達意而已，却不能多多引證。因爲沒有充裕與安閑的時間去翻書。所以本篇依然只是草草敘述，只希望我所主張的要點無有遺漏，至於引證的充足與否則一時顧不到了，還請讀者諒之。

二

我對於宋明理學的見解，和當代賢哲頗爲不同。據我的私見，有幾點可得而言。第一是我承認宋明理學確係繼承孔孟之教。世人多以爲理學是受了佛教的影響，把孔孟的眞義失了。理學思想經過佛教的影響，當然是事實，不

過據我所見，只在方　一方面是受佛家的影響，關於這一點下文當詳說。至於眞正的內容却可說依然由孔孟推廣而出。他們的議論雖不是孔孟自己所說的，而就孔孟所說的來推，却未嘗不可推出這樣的結論。所以理學與孔孟不是兩回事。於是我們先要講孔孟。馮友蘭先生說，孔子就是此「士」之階級之創立者，至少亦是其發揮光大者。因馮先生不承認在孔子以前卽有一種非農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不治生產而專待人之養己者。這些話都很有意思。（馮先生並辨明士大夫的士與此處所謂士不相同，亦甚是，因爲乃是官職的名稱。）我們不要注重其非農非工非商，而要注重其「非官」這一點。大概以前所謂「學」都是指一種技能：農必須有農的技能；工必須有工的技能；而作官亦必須有各種職官的各種技能。孔子講學不是如此。乃是只旨在造成一種「道德的人」。這種人在社會上只是主持正義。使一個社會內有是非的標準完全靠這種人的「清議」。亦不一定要得政權以實行其道。「可以仕則仕，可以隱則隱。」「得志則與民由之，不得志則獨行其道。」「不怨天，不尤人。」其功用不全在於「以其道易天下」，而却在作「中流砥柱」。只須有所影響，不必大行其道，而社會就可以蒙福。其故在於凡行其道者必先得政權。這便是自上而下。孔子以前都是自上而下的。到了孔子，孟子尊之爲「素王」，就是因爲不能由上而下了。於是只好由下而上。這乃只是文化上政治上一個極大的轉變。我們須知自上而下的是個「威權」（Authority），是個「力權」（Power）。一切威權力權倘不加以制限無不流於濫用，因而腐敗了。必須另有一個自下而上的以爲「對抗」（Counterforce）。這個對抗力足以矯正在上者，使其得有清明之氣。可以說政治上的清明之氣全靠有自下而上的推動力。孔子以前，文化未開展，只有自上而下的統治，就可以使人民得福利。後來却漸漸分化與腐敗了。所以時勢上自然有創立一個自下而上的對抗力的必要。孔子應運而生，在中國歷史上眞是一個劃期的事。似乎在孔子以前並不是沒有士，不過那種士只是作官的「預備者」。孔子把他們另付一種特別的使命。所以嚴格說來，士的階級不是孔子所造，而士的新使命却是孔子所創。從此中國政治上有了防毒素。因爲威權政治總是要自身中毒。倘能時時打血清，縱使不能完全去毒，至少亦可減少其中毒的分量。「士」的人們在社會上發清議，作爭諫，便把一個社會內的清明之氣喚起來了，以從事於抵抗這個自身中毒。友人張君勱先生嘗說，一個國家必須容人民有透氣的所在。就是這個意思。如果壓制得絲毫不透氣，則這個國家決不能長存。所以我認爲中國能有數千年的歷史，中間雖有外族的侵略，然幸能綿綿長存以迄於今者，在外國史家有謂由於統一的行政制度，有謂由於文化的統一，而我則以爲至少這個民族的防毒素是有幾分力量的。因爲有了防毒素，才能够保持民族的「活力」（Vitality）。凡一個民族苟不失掉了「活力」，終久必會抬起頭來；即使一時壓倒，亦必會翻身的。所以我願用一個不十分切的比喻，以爲孔子創立「士」的一批人便好像英國立憲史上的創立議會差不多。同是對於政治立一個透氣的所在，使人們不致在威權主義下悶死。所以孔孟之教，其精神上本是反抗的。不拘其反抗的方法如何——以復古爲反抗現狀亦不失爲一種反抗。不但對於當時是反抗，並且永久是反對的。因爲他是自下而上的一種防腐作用。陶希聖先生把孔子認爲是貴族階級的辯護者，由於表面上只看見「君子」「小人」之分。這樣研究學問簡直是胡鬧，眞不值一駁。能繼承這一點的便是理學。至於清儒的考據學在政治社會道德上毫不生作用，不能與理學相提並論。

三

其次我們應得講爲甚麼政治上由下而上的運動必須與道德合而爲一。換言之，即何以表面是道德運動而裏面却是政治問題。我們應得知道一切道德的要求都是根據於社會。不但維持社會必需要某種道德；即改造社會亦必需要某種道德。威權的實行必須有道德的根據：即從道德上要求人們的服從。如人們在心理上不承認有服從的道德，即威權亦不能長久下去。在這一點，我最佩服盧騷（Rousseau）的烱眼。他以爲一切社會關係如完全基於「力」，必致沒有任何團結。凡是社會必須建立於「同意」上。這就是所謂「道德的」。所以社會的維持必是靠人們各各在心理上承認有這樣的一回事，且引以爲對。至於破壞秩序則更需要有一種另外的理由，爲其原動力，然後才能有所活動。可以說都是心理的，亦就是道德的。所謂道德的是指當事人覺得這樣才「對」而言。凡有「對」「不對」的判斷都可說是屬於道德範圍。且不僅此，對不對的判斷必用於人與人之相與。改

造社會的人固然否認現狀上的道德觀念，然而倘欲掀起一個大運動必更須有一種力量以吸引人們來同情於彼。這個力量就是道德的。一個宣教師所以能傳教，喚起許多人跟他走。這個力量必須是道德的。所以社會的維持與改變其背後的力量根本上是具有道德性質的。明白了這一點，便知道沒有一個社會理想其本身不是一個道德觀念。同時沒有一個社會的變化不是先從道德觀念變化起。（縱使道德的抽象原則自身不變，而其具體的應用與範圍必大有變化，因爲非如此不能推動社會使其改變）。根據這個意思，當知我所說的這種自下而上的運動只先從道德方面着手乃是當然的了。

說到此，又有一點必須同時說明方能完全明白。就是須知這種自下而上的活動只在於透氣，防腐，滅毒。而不可認爲是革命。所謂「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便是明證。倘若從事革命，即無「不可爲」了。革命是乙勢力推翻甲政權。後來又成爲乙政權。乙政權依然可使在下者不得透氣。或許丙更起來革命。而這種透氣與防腐的作用卻不須有這樣輪替的變化。只好像對於一間房子開有通風的洞一樣，只須時時有新鮮空氣流入，不必把這個房子拆了重蓋。所以「士」階級的存在，從一方面來看，永久是政治上的通風洞，使清明之氣得息息相生；而從他方面來看，卻又是維持秩序的。自孔孟以迄理學先生們所講的是綱常名教。這都是所以維持社會的。但我們不可因此遂謂都是專爲統治者張目。因爲不是對於某某一定的統治者或階級有所護助，乃只是普遍的維持秩序而已。任何人都可以利用這個維持論以保護其自己的地位。其故即在於這種自下而上的「干政」，只是「干」而已矣，並不要「執政」，且在勢亦永不能執政。原來只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所以這種「干」政的人必須要立足於道德問題上。且其本身所需要的道德尤須高出常人數倍。其情形有幾分好像西方宗教上所謂「殉道者」（Martyr）。孟子上說：『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何爲恒心？即『養其大體者』，亦即『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故能至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關於此點下文尙須多多討論。

現在又須說到一個附義。即這種「士」並不是一個嚴格的階級，因爲沒有經濟的背境。不但沒有經濟的根據，並且因爲士是「不治產」的，其社會的地位至不鞏固。這乃是一個大缺點。所以由於經濟的壓迫只得流入於官僚。幸而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士的學問不是十二分專門，只須幾本書（例如後來只須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種）。在鄉間亦容易得到。有些理學家都是出身於農，便由於此。凡出身於農的都能有充分活力。這一點足償前一點（即流入官僚）之失。

四

自從韓愈說：『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孟軻死不得其傳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他們的託辭，不必多講。以孟子來繼孔子，足見後世所謂「道學」（即理學）乃只是孟學。從此以後都順着這個趨向而走。其所注重的便是孟子所主張的『反身而誠』與『養浩然之氣』等等神秘的方面。至於他們以爲孟子得孔子之正傳，亦未嘗不由於孔子的話亦有這樣傾向。例如論語上講「仁」。從最淺的方面來說，是只等於「愛人」；但從最深的方面，卻說『若聖與仁，堯舜其猶病諸』。可見從修養上修到仁並不是十分容易的。因此後儒把仁當作一個特別境界，這原是可以講得下去的。所以我說理學上所講的驗之於孔孟並非不可通，不過不明顯而已。因此我認理學確是繼承孔孟之敎。此說和時賢以爲孔孟平常而宋明玄妙之說頗有出入。其故因爲我的着眼在於欲提高道德必須以形而上的神秘爲背境。沒有這種背境決不能解決道德的保障問題。普通的道德和這種情形不同，因爲只是拘束常人的。只須拿習俗與法令便可把他們規範着了。而負了特別使命的「士」則不够。必須把尋常的道德（即由習俗而成的）視爲非道德，而只自己制出更高超的道德觀念。須知這種道德觀念與實際利害禍福必不一致。於是便發生一個問題。即爲甚麼要作好人？因爲作好人不得好報。若解決這個問題又必須把神秘經驗抬出來。使自己的的確確覺得小我已與大我合一。於是人生意義與道德保障便完全寄託在這一點上了。所以我說理學內無論有何派別之爭，而大體上總脫不了是神秘的整體主義。（mystic interalism）。請以張子的「西銘」頗爲顯然。總之，都是想把我與天合一（即與絕對合而爲一），於是我盡其性，則我之一舉一動便心安理得。故我看透他們主張整體（即萬物一體）乃是專爲道德立一個最後的孔子，使個人有安頓處。有了這

個天人合一的「靈性」，則行爲上一切利害禍福便不發生問題了。你如專從學理上看，你可以說這是一種形而上學。你從社會上有這樣超世俗的道德的需要來看，你便知道此種理論不過是要滿足這個需要，使這些人們安然生活下去，得在社會政治上起一種作用。從我這個觀點來看，我便以爲這個形而上學只是添上去的。但這個添加却是必然的。所以就必然的推演而講，由士的奇特使命便必然生出這種小我與大我打通的人生哲學，由這樣人生哲學便必然生出萬有一體的宇宙論或形而上學。這種推進雖只是一種逆溯，然却是必然的。因此我主張縱使中國不與印度思想交通，其推進恐怕亦必定是如此的。所以有人以爲宋明理學完全是從佛理蛻化而出，其實這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談。

五

但理學確是受了佛學的影響，我現在即要講其所受的影響究在甚麼地方。照上文所說，當知關於整體觀念一點，雖事實上理學亦受佛教的影響，然在論理上却並不是完全出於佛學。可見其最受影響的地方不在於思想內容，而却在於方法。何以故呢？據我所見，乃是由於孔孟雖本含有神祕主義，却始終沒有所以親見此神祕之方法。換言之，卽沒有修證方法以親證此種境界的確實存在。至多只能有理論上的推論。而這些理論上的推論，好像「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等類，雖足以證明萬物是無盡，或宇宙是一體，然總不免流於詭辯。詭辯便很難令人完全信服。所以於此種理論的推證以外，必須另外還有有力的證明。這一點上恐怕中國的學者已經很少有辦法，——莊子的「坐忘」其方法早已失傳了。當此時恰巧印度思想傳了進來。印度思想始終是兩方面兼顧的，有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這兩方面就是知識上的理論與修行上的實踐。知識方面的那一套理論比中國要玄妙精密得多。可惜有一點比中國不同。就是印度這一套的理論純粹是形而上學，換言之，亦可以說是宗教性的。不像中國的那樣，是道德方面的（卽倫理性的）。這種純粹宗教性的形而上學，因其主旨在於出世，在中國「士」看來，便沒有多大的用處。因此他們不甚接收其理論方面的東西，而事實上却對於其方法不能不引起很大的興趣。正因爲在這一方面是他們所本來缺少的，且須要補充的。於是他們自然而然受了佛教的影響，他們自已亦不知道影響在何處，後人研究亦就專從表面上看了。

就印度的一套修行法來說，雖有種種派別不同，而大概可以總稱之爲「瑜伽」（Yoga）。用不十分嚴格的話來解釋，亦可說就是「禪定」。關於這一點，我在拙作「論出世思想」一文，言之甚詳，希望讀者能一參照，現在且不多述。這一套方法不外乎把人「心」變化一下，能見到絕對。——卽所謂直證眞如。但此法又有頓漸二途。大概印度所修的以漸居多。胡適先生論禪宗，以爲頓悟是中國人所發明。我對於考證向未用功，不敢說其中有無問題。退一步講，設此說而眞，則中國除了發明頓悟以外，還有一個大發明：就是把出世的修悟方法而用於入世。作此種發明者就是理學家。所以我願對於理學上一個徽號曰「中國的瑜伽」(Chinese Yoga)。

謂余不信，請列舉各理學家的見解和其自身的親歷以證之。先講其修行的經歷如下：（一）胡安定（瑗）『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二）邵康節（雍）『怡然有以自樂。』（三）周濂溪（敦頤）『嘗得疾，更一日夜始甦。』（四）程明道（顥）『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背。』（五）程伊川（頤）『嘗瞑目靜坐，游定夫楊龜山立侍不敢去，久之乃顧曰：日暮矣，姑就舍。二子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六）張橫渠（載）『疾作，抵臨潼，沐浴更衣而寢；且視之，逝矣。』（七）朱晦翁（熹）『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旣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以上不過隨便舉幾個例而已。至於以後，象山、陽明更是靠頓悟工夫了。（陽明赴謫至貴州龍場驛，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理，不覺呼躍而起，從者皆驚。）姑舉王門的兩個例：（一）聶雙江。『獄中閑久靜極，忽見此心眞體，光明瑩徹，萬物皆備；乃喜曰：此未發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從此出矣。乃出而與來學立靜坐法，使之歸寂以通感。』（二）王心齋。『一夕夢天墮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舉臂起之，視其日月星辰失次，復手整之，覺而汗溢如雨，心體洞徹。』卽此亦可概見其餘。可見他們不獨在思想上主張修行，並且自身亦實行之。至於他們的修行方法如周濂溪主張無欲，『無欲則靜虛動直』；邵康節主張『心一而不分，可以應萬變；』張橫渠主張『大其心則體天下之物』；程明道主張『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程伊川

亦主張「事事須用敬」；至於朱子亦有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之說。總之，他們主靜或主敬都是一種類乎瑜伽的方法。此種方法把人「心」使之變質，使其不囿於見聞，而直接與外物相通。這乃是一種變態心理（但非普通所謂變態心理）。他們把印度人的方法原來只用以窺證眞如的，卻拿來用於處世。換言之，即把限於在宗教上的方法卻移來用於人生問題上。再換言之，即把出世的證覺了悟的方法改爲處世接物對人之用。我最初認爲他們是失敗了，因爲二者在性質上太不相同。後來我又想了一想，覺得其中確有一部分的奇怪。就是他們的注重點不僅在「寂然不動」而尤重在「感而遂通」。必須寂然不動方能感而後應。即寂然不動只是一個手段，爲了達到感而遂通的目的。例如濂溪於靜虛以外必須更有動直。這便是他們和佛家大不相同。似乎佛家只求寂然不動而有所「見」爲止。此見即爲見本體。從出世的觀點來講，當然見了本體就完了。從宗教的觀點，亦只須見了本體就完了。因爲見了本體，便安立了信仰。但就入世的觀點與作人的觀點而言，則見了本體還不能完事。按理，入世與作人本不須要見本體。不過爲了道德的保障與人生的意義起見，見了本體便大有用處。其作用可以說不僅是使頑夫廉，懦夫立；並且可使人臨死不懼。這便是上文所說爲了「殉道者」而設的了。所以中國的瑜伽與印度的不同。印度是屬於宗教的，而中國是屬於道德的。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要以爲理學是烏煙瘴氣，而遽謂爲毫無價值。其實乃是一個大發明。

六

這個發明的可貴處即在把印度的瑜伽的性質改變了。印度的瑜伽因爲與出世教相連，總不免由「寂」入手而終於慈悲。而中國的這種瑜伽卻無論用頓悟或漸悟，其結果乃是得着一個「樂」字。所以他們注重在日常生活。務使在日常生活上，把此心使其「活潑潑地」。遇事便可「當下合理」。這就是所謂「動直」，與所謂「靜亦定，動亦定」，可見他們不是專在靜中求明心見性，乃是在動中（即日常生活一舉一動中）求盡性樂天知命。有人以程、朱是理學，陸、王是心學，我所說的只能適用於陸、王。此說實爲皮相之見。程朱所講的「理」並不是離了人以後的萬物之「所以然」，乃實在是與人合在一起的萬物之「所以然」。我們把整體觀念加入其中，便不致有此誤會。從這一方面看，便見中國的理學純是關乎行爲，並無宗教的意思。亦可以說他們把宗教性的神祕移用於極尋常的行爲上。於是一切德目如忠孝節義便都有了自然而然的安託。我們只須一檢「東林列傳」便見那些人的死節之烈。東林不過一部人而已，然而亦可概見其餘。其故即由於『不知生死必不能忠義，不知忠義必無經濟』。即以形而上的見性爲人世上道德的保障，以有保障的道德而從事於政治活動，則必更爲有勁兒。所以我說理學不是純粹的哲學。

根據這一點，我們又可見所有的理學家對於政治無不干與。這原是出於他們的濟世利人之心。這種濟世的心是從「民胞物與」的觀念而來。雖然從儒家的道理上講，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個士人修了身自然會推到治國平天下。不過照我的觀點來看，依然是爲了治國才去修身。所以「欲治其國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必先修其身」，這句話倒是頗有所道破。換言之，即本來是只爲治國平天下，至於修身誠意不過是個手段而已。可見政治活動是他們的眞正目的，至於由自己的道德問題而上溯到形而上學上的悟道，都不過直接與間接的手段罷了。所以我說「士」階級的使命根本在於「干」政。其講學不過手段而已。可惜他們的干政與泰西所謂憲政、革命等等完全不同，只是想「致君堯舜」。這種辦法乃是一條絕對走不通的路。不過他們卻「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至少亦未嘗沒有若干成績。就是把專制君主的腐敗暴虐稍稍挽回了些。所以我說，他們只是威權政治高壓政治下的透氣洞與消毒素。倘使沒有他們，政治的自身中毒還要來得快些；社會的自行奔潰還要來急些。他們在歷史上的使命，在我看，可算已經盡了。

到了今天，士的階級已完全不存在。其故有二。第一是到了清朝，乃是外族操統治權，表面上雖推崇所謂「正學」，而實際上對於讀書人已早不容其有這種氣概。以致流於虛僞。而餖飣的考據學乃乘運而起。第二是西方文化的傳入。西方文化有一個奇怪的地方：就是在西方本土可以把宗教與科學合在一起。因爲在西方人，這種調和只是事實上莫知其然而然，本沒有邏輯的關聯可言。而凡傳染西方文化的他種民族卻無法這樣照辦。所以科學與宗教的衝突在西方人不過是一個理論上的問題，不致引起生活上的衝突。而他種民族則不然。苟一傳染了西方的科學必定動搖及於全部

生活。所以清末數十年，總時時有「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爭論，就是爲此。——直到現在還有人提起，可見其中確有問題。由於這二點，所以士的使命在歷史上可算已結束了。

七

如拿西方情形來比較，我們雖則很難在西方社會上找到與「士」相類似的階級。這原是中國社會的特點。我並且認爲這是中國民族的優點。中國民族屢次被外族侵略。而侵入的外族其本身都沒有類乎「士」的階級的那種性質。他們雖握了統治權，而却不能不吸收中國文化。而他們所吸收的中國文化只是中國文化中的腐敗方面。其結果他們腐化了，漸漸至於衰亡。而中國民族本身仍由「士」的階級在千辛萬苦中維持其一線的生命。中國所以能有二三千年的歷史，比外國任何民族的生命都長，據我看，就是由於此。

退一步來說，我們可以勉强拿歐洲政教分離以後的教士來比中國的士。耶教在歐洲政治上不能說沒有很大的影響。因爲政教分離以後，教乃偏於注重「個人良心」，自然便帶了一些反抗强權的味兒。泰西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與其說是純出於政治運動，毋甯說是隱然由宗教而衍進的。就中尤其是所謂「清教徒」（Puritans），其守身律己不下於中國的理學家。美國的建國全靠這種清教徒，這是大家所共知的。

我們如把君主官僚軍閥列爲第一第二階級，則士便是第三階級。但與西方的中等階級却不十分相同。因爲在西方中等階級與工商業大有關係。宗教上的個人主義與政治上的人權革命以及經濟上的工商業發達乃造成中等階級的得勢。中國的士却始終沒有得勢。有人主張中國今後亦應該仿照英國來一個產業革命。已故的丁在君先生曾親口對我這樣說過。不過現在的情形恐怕已經錯過了。所以我不認中國的士就等於西方的中產階級。我只能說士的使命在中國歷史上算已經完了。

本來文化的開展是漸漸向普遍而趨的。在君主官僚握一民族一國家的生命的時候，這一個民族或國家便靠着他們以決定其前途。推演下去，久而久之，他們在勢不能把握這個生命了，自然另有階級來担負其使命。士的階級的產生就是因爲君主官僚不能應付這個時代的使命了。從這一點來說，我敢說中國今後担負這個使命的恐怕已經由士而移到大衆了。馬克斯說勞動者無祖國，這是指另有階級担負國家責任的時候而言。在那種狀態下，勞動大衆自然不負國家的責任。然而等到文化下移以後，國家的責任與民族的前途便會自然而然移到大衆的雙肩上。於此所謂大衆不是把士除外，乃只是使士與大衆打成一片。自知識與品德而言，恐怕士還是居領導的地位。

士的使命在歷史上已經講了。今後有一個新時代將要來了。士如果要仍然担任一些使命，則决不能如產業革命者所主張，化爲歐美式的中等階級。我以爲只有加入大衆中，在大衆中除了担任技術知識的需要以外，依然可以行使其提高道德的任務。換言之，即把大衆的道德水準設法提高，這就是他們的唯一任務。（不過其中仍有個生活問題，似十分複雜，但本篇以篇幅有限，不欲討論。）所以理學不是完全過時貨。不過必須有人出來爲之大加整理，使其與現代的需要相符合，而删去一切迂腐之談。這便是我所希望於君勱先生所辦的學院的了。

（一九三九、八、一二）

民主政治與自由

鄒文海

民主政治產生於自由主義之後，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假使現在的歐洲人還是除聖經外不能讀其他的書籍，還是除天主教外不能有其他的信仰，還是除帝王外不能有其他的威權，我們很難想像如何會有民主國家產生。閉塞的社會，迷信的傳統，專制的威權，完全是不能生長民主種子的石田。如果這許多束縛不能層層解除，斷難發生民權的哲學，自然也會不能產生民主的政治。而這層層束縛的解除，端賴自由主義的偉力來衝破這重重的堤防。自從宗教革命以來，西方人在自由主義領導之下，先後把宗教政治以至經濟的牢門打開了。也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十六世紀以來的政治潮流，是一貫的向民主更民主的方向前進。在西洋的政治史中，我們不難看出後浪推前浪的運動，都是使人民在國家中的地位日見重要和尊嚴。人民從無知無識的奴隸，變成有選舉權的公民，這是要經過無數的奮鬥和努力的。但是沒有自由主義作動力，一切的運動都會歸於失敗。沒有自由主義，洛克沒有勇氣寫他的人民政府論，盧騷也沒有勇氣寫他的社約論，至於一般的革命團體，也不會做出種種革新的事業。民主政治是自由主義所產生的，大概不會有什麼人否認這個論點。

回想宗教革命之前，歐洲人的生活思想以至社會組織，都同我們大同小異，可是宗教束縛一解除，居然使自由的種子發芽生長，以後就逐漸進步到了今天，生活舒適了，思想開明了，組織民主了，前後比較，相去何止天壤。而這種變遷的所以造成，自由主義的供獻最大。宗教革命就是一種自由主義。宗教革命攘除教皇的束縛使信教者人人可以通達上帝。這個革命對於做人的態度發生劇烈的改革，此後造成哲學上的懷疑主義，思想上的寬容精神。當然，十六世紀以來的進步也不是風平浪靜的，中間還有許多反動的插曲，不過大體的說，自從自由主義發生了它的力量，趨向於合理以及接近於民主的運動始終沒有間斷過。這種歷史上的教訓，愛好民主的人實在不應該忽略過去的。

我們若分析近代民主政治的內容，實不外自由主義功利主義社會主義以及科學的結合物。民主即是合理化的要求。思想合理化的要求產生了自由主義，法律合理化的要求產生了功利主義，經濟合理化的要求產生了社會主義，生活合理化的要求產生了科學。凡此種種，又莫不以自由主義為其發端，所以十六世紀以來，每一世紀都有對於自由的呼籲。沒有自由，功利主義社會主義以以及科學都不會成功的。

現在自由主義很受到一點批評。許多人認為自由主義是思想上不負責的態度。一切放縱的行為，都可以美其名曰自由，所以自由主義盛行以後，社會中就變成漫無標準了。這是對於自由主義完全缺乏理解的人的說法。自由不是一個人的自由，而應容許所有的人自由。一個人自由是專制，而允許大家自由，則我的行為無往不受他人自由的限制，如何能儘量放縱自己而變成漫無標準？自由的社會才可以產生公是公非，一切人當以此公是公非為規範，決不能假自由之名以胡作胡為。歐洲是比較有自由的社會，可是歐洲社會的秩序與紀律，實遠勝於沒有自由的社會。沒有自由的社會亦許也有法律制度，但這種法律制度無非一人或少數人的私意，約束人的力量非常薄弱的。又因制定法律制度的一人或少數人，往往因不方便而自己不遵守這種法律制度，所以法律制度的尊嚴更受了打擊。這在自由的社會中絕對不可能的。在自由的社會中，法律制度是公是公非的結晶，任何人很難以私意去破壞它而不受制裁。因此之故，自由的社會中人人須為他的行為負責，而沒有自由的社會才是不負責的社會。要說漫無標準，也祗有專制的社會才發生這種現象。

對於自由主義的第二種批評，說自由主義的產生發達，均與資本主義並行，因此它是和資本主義一鼻孔出氣的。賴斯基教授的「歐洲自由主義的產生」，就在說明這一個觀點。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有同一的發展過程，我們不能否認這種歷史的事實。而且因為它們有同一的發展過程，所以

精神的內涵也是唯有其互相交織的地方。比如說自由競爭爲資本主義的理論基礎，而自由競爭顯然就是種自由主義。但是作這種評判的人，最多可以說自由主義應該脫離資本主義而獨立，決不能卽因此而唾棄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的發生普遍影響，必須在有產階級加以愛護之後，那是必然的。教皇專制國王以及貴族，都是些痛恨自由主義的人，在這個時期，可以與他們對抗的，惟有將要抬頭而還沒有抬頭的商人。商人對於自由主義自亦有其愛好的理由。因爲自由增加了他們積聚財富的路徑。所以在這個時期，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很自然的結合起來。不過這一種結合是很富有時間性的。自由主義的本質，不一定與資本主義相調合。資本主義發展成熟，多少會走上獨佔和獨霸的道路，而獨佔和獨霸是與自由的精神相違背的。我們不必談資本主義對於歷史的功過，而祇要看資本主義最後所採取的方法——經濟集團包辦的方法，就可以知道自由主義總有和資本主義分離的一天。到那個時期，自由主義就可以更顯出它原來的本質了。

在王國初產生的時期，自由思想者往往托庇於有威權的帝王之門。就是宗教革命的發動者——路德，他也要靠德國諸侯來保護的，在那個時期，自由主義者的主要目標就在孵育王國的誕生。而民族王國的出現，顯然也受過自由主義的恩惠。曾幾何時，王國又變成自由思想的摧殘者，而自由主義也到底變成傾覆王國的進步力量。當自由主義與君主專制相結合的時候，一定也有人說自由主義就是民族王國主義的。不過最後證明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了。民族王國的方式，本質與自由主義不同，所以初期雖會合作，最後總是要變成兩種矛盾的思想。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其合與分的過程大抵也是如此。我們如何能說自由主義就是資本主義，更何能因爲厭惡資本主義之故而也唾棄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是什麼？自由主義是近代社會中惟一的進步力量。近代社會之所以能日漸合理，自由主義的供獻最多。將來的社會中，它所以能進步所以能合理，一定還要靠自由主義的輔助。民主政治是種進步的制度，也是種合理的制度，它的發育與健康，自然也要靠自由主義的輔助。民主政治不是種死的理想，它的內涵是活動而富有伸縮性的。從十八世紀以來，人類一直追求着民主的理想。而近三百年中，進步國家所標榜的也是它們的民主政府業經完成。可是無論那個民主國家，它的精神的確是常常在變動的。卽以英國來說，喬治一世統治之下的民主，不同於維多利亞女王的民主；維多利亞女王的民主，又不同於喬治六世陛下的民主。選舉權利自限制而至於普及，國家政策自利少數人而至於利衆人，人民地位自無足輕重而至於逐漸握國柄，這都是英國民主逐漸變遷的事實，也是英國民主逐漸進步的事實。而每一次變遷，每一次進步，都是以自由主義爲發酵劑的。擴大選舉權的運動中，休謨和小穆勒再度闡明自由的重要。小穆勒的名著「自由篇」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問世的。其餘兩種進步的造成，也都經過自由言論的領導。

自由主義爲什麼會發揮這樣偉大的功效力？理由極爲簡單。惟有自由的愛好者能認清眞利眞害，所以也惟有自由主義能促進進步。自由是發展人類潛藏智能的工具，因此自由主義之下人類乃能充分利用其才能。自由是反抗武斷的利器，因此自由主義之下人類乃能不受專橫的毒害。自由是權利的基礎，因此自由主義之下人類的利益乃能有充分的保障。總之，自由能使人類有更美滿的生活。

從我們以上所說的。我們可以知道自由主義並不就是民主主義，但自由主義確可以輔助民主主義的發展與進步。自由主義祇是達到民主的工具，而不能作爲民主政治的目的。沒有自由一定不能得到民主政治，可是有了自由又不一定能說就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比自由主義更高的一種境界。民主政治中不但需要自由，而且需要人人參加政治，更需要滿足人人的利益。我們當然要寶貴自由主義，卻又不能認爲得到自由就是完成了民主政治的理想。

因爲自由主義能輔助民主政治的發展與進步，愛好民主政治的人自然不應該菲薄自由主義。不但不應該菲薄自由主義，而且還要歡迎自由主義。反對自由主義的人，不是因爲厭惡逆耳的良言，就因爲生性專斷。自由，不問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或是信仰的自由，對於合理的威權決不會是種妨礙。自由思想者所指摘的對象，應該就是必須改進的幾種事實。而且自由主義者在批評的態度之外，也有其積極的精神，它產生了公是公非。公是公非是政府政策所追求的鵠的，故威權亦殊無厭惡自由主義的理由。就說自由主義者採了批評的態度，那也是威權求之不得的箴言，也萬無加以歧視的道理。民主之有異於專制，其最基本的一點，就在於民主活動而

專制死板。民主的所以活動，因爲每人可供獻其意見，專制的所以死板，因爲完全由少數人包辦和把持。每個人可以供獻其意志，自然這個制度可以吸收各種優點而活潑有生氣了。少數人包辦與把持，未免就要停滯於少數人私利的觀點之上。

我們充分的相信：任少數人自由是絕端危險的。父母溺愛之下的子女，那股但知有已不知有人的樣子，任情使性是他們的習慣，頤指氣使是他們的常態，這是所謂嬌縱。這種嬌縱的色彩一傳染到政治，又就是專制造成的原因。但是爲什麼會造成政治中少數人的嬌縱呢？因爲祗有少數的統治者有自由之故。祗有路易有自由，祗有尼古拉有自由，而其他人沒有自由，這是專制。因此之故，自由主義的眞精神，一定得把享受自由的人天天加以擴大。大家都有自由，民主的理想也就到了誕生的時期了。凡是反對自由而想建立民主的，那種都是以民主爲裝飾品的人。封鎖人家的嘴而說他已經自甘服從，那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談。許多人稱民主政治爲意見的政治。沒有不同的意見，爲政者儘可任意指揮，還有什麼政策的選擇，還有什麼民意的依歸？但是意見並不能製造的。享受到自由的才有資格表示意見，不然，希德勒和穆沙列尼統治下的國會爲什麼祗能做傳聲筒呢？

自由的眞義，雷佛斯已曾說過：完全是相對的。換句話說，現實的社會中，自由均有其限度。他提出政治的自由和經濟的自由作爲對照。在二十世紀的初葉，政治自由大家承認其有限度，經濟自由大家不承認其有限度，以至政治自由就有發生流弊而經濟自由造成資本主義了。絕對的自由，祗有少數的幸運者可以享受，而相對的自由，才是大家可以分嘗的美味。我們既不願意自由成爲少數人的禁果，自然應當大家尊重這個客觀的限度。不過這個客觀的限度，必須十分客觀，換句話說，必須得大家的同意，而決不能是少數人武斷地規定下來的原則。

我們十分了解所謂自由的限度是種實際問題。通常的情形，這個限度規定於法律之中，但亦有許多時候是引起糾紛的問題。合理的社會，法律爲共同願意遵守的原則；但亦有許多時候，法律落於時代之後，大家就懷疑到這種法律是否合於理性。法律而成爲共同願意遵守的原則，這證明法律是各人願意遵守的客觀標準，而這個法律所限制的自由，各人也認爲是享受權利應盡的義務，決不致引起懷疑與批評。可是社會的進步，使舊的法律不合時宜，而法律中規定自由的限度，一般人乃認爲是種束縛，到這種時期，法律成爲問題，而自由也成爲問題。法律之所以成爲問題，因爲多數人不願意再遵守這項法律了。自由之所以成爲問題。因爲一般人自由的觀念，與政府當局的自由觀念相抵觸了。騷動與混亂亦許要在這種時期產生，而自由問題的解決，往往就非和平的手段所可以求得。辛亥革命以及北伐，恐怕就是代表這種時期。滿清政府以及北洋軍閥，都有它們所頒佈的法律。可是這種法律，過於落伍，尤其對思想自由以及言論自由的態度，決不能爲一般革新運動者所容忍。至於擁護舊制度的人，又把批評舊制度的人看作洪水猛獸。由是新舊之間，發生了不易解開的僵局。革新運動者最後的目的，並不祗要說幾句話發表幾篇言論，而是想建立一種新的合理的政府制度，對於自由的要求，不過是一種手段而已。擁護舊制的人也知道這一點，他們壓制言論禁止自由，無非想從根據除革新運動的要求。表面上雖然是自由與不自由之爭，骨子裏實在是舊制與新制的生死競爭。因此之故，擁護舊制的人態度會愈來愈可怕，而革新運動者的態度也會愈來愈激烈。

從社會進化的觀點來看，建立新的合理的政府的要求，往往就是種民主的要求。過去二千年的歷史，專制佔據了很長的時間，但每一次改革，證明總是向更民主的方向前進。所以在自由發生問題的時候，守舊者實在更應該抱容忍的態度。自由主義之發生意義，並不在於安定和有秩序的時代，自由主義的偉大的功用，正是要在社會擾攘不安之際能減少不必要的進步的障礙。

許多革新運動者，他們的政權一經建立以後，往往也變成自由的摧殘者，那種態度一樣是不智的。爲革新運動者辯的人，總是說新的制度基礎還沒有鞏固，爲避免中道崩殂的危機，壓制守舊者的乘機反動是種必要的手段。這種理由顯然是不充分的。革新運動之成功，證明新理想已爲多數人所接受，守舊者並不能顛倒是非爲革新運動之患。革新運動者而反過來採取壓制的政策，無非自己斷送了進步的前途，不要多少時候，自己也要變成守舊的力量了。爲避免革命勢力的腐化，不斷採取自由的政策實在是必要的。

二十世紀的中葉，世界中先後發生了兩次規模宏大的戰爭。每一次戰

爭，勝利國家所標榜的都是爲自由與民主的安全而戰。但是戰爭之後，勝利的國家是否眞向自由與民主的途徑邁進，實際上都生問題。美國大理院院長韓奇博士曾於第一次大戰之後很沉痛地說：美國這個國家的民主政治是否經得起第二次大戰的試驗，實在很成疑問。戰爭之中與戰爭之後，爲政者的態度往往厭煩自由主義的論調。所以每經一次戰爭，自由多少要受一點打擊，而民主政治的前途，也要加上一重黑影。爲自由而戰的人總是要失掉一點自由，這是很可悲的。

這一次戰後是否能避免這種不圓滿的結果，完全要看世界人類的努力。按理說：過去的經驗即是今日行爲的指導，這一種失敗是不會再有的了。尤其對於新聞的自由，勝利的國家曾視爲重要的努力目標。對於自由的愛護似乎又有了新的信心了。但願人類能永遠抱着寬容的態度，使歷史更順利的走向合理之途，而民主的政治也可以在康莊大道中進步。

逆流與歧途

孫克寬

世界向前進，前進的指標是自由、和平、民主。鋪開這個道路的工具是科學。反着這個指標的便是逆流。妄想着把世界拉回去，更是逆流！已經淸楚了世界前進的方向而不肯勇敢地接受現實，徘徊在歧途上者，更是愚蠢！

世界這種進步的動向，是遠在歐洲文藝復興期開始的時候。人類經過了草昧和封建時期，學會了生活方法。由於自然的覺醒，生出對眞理的需求。科學知識的萌芽，相對的改善生產方法，讓社會結構起了變化，才把人類帶進了「近代」文明社會。伴之而起的，才有「人權」運動的呼聲，節次地打破專制愚昧的枷鎖。經濟學者把它解釋作生產條件的變化，政治學者把它作爲政權的革命，文學者歌頌它爲黎明的到來，哲學家們又會把它當作人類求知所得的果實。姑不問它怎樣，這的確是鉅大無比的洪流。它推翻了路易王朝的寶座，締造了光輝燦爛的新大陸，也蕩滌了四千年專制帝皇在中國的毒穢，更給與前一代和這一代的人們以現代文明的各種生活享受。梅特涅嘗試着阻擋它，可是失敗的是他而不是它。希特拉、墨索里尼之流，不服氣再來一回，滅亡十四國，氣吞全世界，結果呢？「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爲什麼這樣？主觀地是人性問題。誰不愛自由，誰不愛光明？誰願意長期奴役？誰願意戰爭死亡？科學給人以光明，同時指示人以眞理。眞理所在，人爭趨之，鍥而不舍。法國的革命才亘八十餘年底於成功！客觀地是物質環境變化，舊方法應付不了新時代，解決不了新的問題。勉強掙持，終不免於走上失敗之路。我們溫習史例，誰逃過了這個公式？那件事發生了例外？

不幸的很，人類善於遺忘，政治家們總不願接受歷史的教訓，以正義的力量，才打倒侵略的勢力，到自己來支配世界的時候，便又炫耀着自家的武力，無視當面的洪流。在世界，以大西洋憲章，天下一家的精神，打倒法西斯集團，創造聯合國這個人類大家庭。不旋踵間「勢力範圍論」又在抬頭，強國各自製造了它們的勢力圈　把弱小國家做她們的附庸；把征服國家的人民，做她們的奴役；把中間國家做她們的玩弄工具。一邊是對殖民地不肯放棄，對弱小民族要繼續宰割，一邊是鯨吞蠶食接壤的國家，巧取豪奪，脅迫良善無罪的小國做犧牲品。製造人家內部的糾紛，分裂人家固有的主權領土。在中東是這樣，在遠東是這樣，在巴爾幹半島更是這樣。這和第一次大戰後列強角逐的情勢，有什麼分別？聯合國變做大國的工具，又和舊國聯有什麼分別？狂熱的軍備競爭，幾乎已漸臨戰爭前夕；假如肯讓人類用理智來思索，當眞有什麼問題不可以解決嗎？明明白白地在大西洋憲章上面寫出給予人類以四大自由的諾言，爲什麼不肯實踐？卻要來舊夢重溫，「以戰爭求取和平」，豈非是逆流？

在中國，尤其令人莫測。三十五年的內爭外侮無休歇的戰爭，已使人民痛心疾首不肯再打仗；團結抗戰的勝利，已告訴中國建國必由的道路。國父中山先生「和平奮鬥救中國」的遺訓 與扶病北上主張召開國民會議的偉大行動，已遠見地爲建設中國指示一條必由的目標。世界上民主勢力抬頭，人民的意思被尊重，已由有力的友邦經常予我們以影響。原子時代戰爭的恐怖，和世界上兩種主義集團對立需要中間力量來調和的尖銳事實，在在足以提醒中國只能自立生存，不能畸輕畸重。這些存在的條件，都不能喚起覺悟，終於燃起了戰爭的烽火，誰爲厲階？豈不更是一股逆流？

從上面的分析，世界與中國，已爲逆流拗轉方向，走向毀滅的深淵。這種責任，並不在於一方。構成這種的原因，一般說有兩點：

第一是傳統的成見。從國際方面說，國家觀念的過份誇張，疆界的猜嫌，安全感的過分敏銳，造成兩個集團心理的對立。邱吉爾「歐洲聯合國」，動機是如此，斯大林東西「鐵幕」的構造，動機也何嘗不是如此？不撤除這種成見，人類便永遠不能融合。從中國說，便更覺得傳統成見之作祟。政府的法統觀念，很容易把一切黨派摒諸門外，而中國共產黨的階級性與黨性的發越，何嘗又許中間人存在？「予用予法，我用我法」。這一方面非打破現狀不可，那一方面便非維持現狀不可。政治的制度，軍隊的編制，如何可以協商到一處去？別的國家政黨無武力，只可以辯論於議壇，到中國就非「一打」不可！

第二是英雄的思想。民主是服從多數，大衆所能接受的便祇有平凡的人物，也惟有平凡的人物，才能儘守法度，安定民生。法西斯集團提倡英雄，墨索里尼的東征阿比西尼亞，還不是要做愷撒第二？希特拉戈林之流，更完全是狂熱的英雄主義。英雄們的政治，祇是表演，而不是設施。華盛頓、傑弗遜，便不這樣做，才替美國奠定太平。國際上今天、新英雄們又在表演了。由於戰爭時期的宣傳，神化了若干領袖人物。邱吉爾的老不自休，鼓高樂的靜極思動，蘇聯的英雄勛號，更不知鼓勵了多少冒險家出來。在這裏，世界是眞眞拉回去了。誰想到五百年前東方騎士攻城掠地的精神，還爲近代英雄們所神往呢？在中國來看，我們的政治一向是威權政治，做領袖的要「言莫予違」，做官的要「一朝權在手」，在社會上混的要「把點顏色你瞧」，整個地是「有己無人」，有力量而無理性。即以今天所自命最民主的解放區而論，眞正人民的意思在那裏。那一種運動，不是以死亡來威脅？對政治路線的爭持，還不是個人鬧意氣？從政治協商起到現在，所有談判未成的癥結，還不是一大半都在爭黨的地位，爭黨的威權？人民的利益和生存，誰肯顧到？中國古詩「一將功成萬骨枯」，我們每次看到驅民兵作戰和掘堤放水的新聞，眞是毛髮凜然！英雄們的表演愈精彩，老百姓愈倒霉！

我總覺得我們的政治家太自信了，太忽視眞正人民的力量了！無論朝野兩方面，都不免有這種錯誤。先談共黨方面。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案，對中國政治問題，固然沒有徹底解決，可是已指出中國走向民主的道路。循此而進，可以結束現在的黨治局面。可以實施兩級地方自治，遠較英國和歐洲大陸各國有更大的地方權力的自治制度，提供人民參加政治的機會，解除人民對戰爭的威脅，使共黨地下的工作，公開合法地向全國人民面前競爭，贏得同情，很可能地把革命的目的，以和平方法成功。在友邦協助調解之下，即使軍隊武力交出，也不會被政府消滅。爲什麼不這樣做？而必定要採取武力侵奪地盤的方式，派兵出關，爭取東北，久佔蘇北，蹂躪人民，以幹部錯誤的行動，造成蘇北魯南各地人民的集體逃亡，暴露無比的恐怖，殘酷的印象於國內國外，打擊自己的威望。一面又不估計自家軍力，盲目地進行陣地攻守戰，殺人盈野而節節退後，造成今天的政治僵局？

再就政府方面來說，從採取「軍事自衛」政策以後，征糧和征兵，正繼續在各地推行，由於基層行政人員素質不良，政令到下面去便變質，使人民加深地厭惡戰爭，加深地厭惡現狀。其實，只要公平的發價購買，在改善運糧和儲備條件之下，中國何嘗無糧？犯不着倒退一百年去做法「漕糧」來征實。只要嚴禁缺額，計畫地運用都市鄉村失業的丁壯，提高待遇，杜絕中上層的剝削，依然是「有兵可用」，用不着在戰爭季節來征兵，使正當良善的農民，遭受苦危而無補實際（不自發的當兵，只有逃亡一途）。其次是經濟的政策，信賴外貨，壓抑本國工業的心理，造成了工業的不振，土產的滯銷。外匯黃金的運用，只是傾國家經濟於賭博之中。財政金融與經濟生產脫節，其結果只是造成投機暴利的階級發財，動搖整個社會的基礎，從這裏影響到政治風氣的日益頹靡。良善的公教人員，社會中

望的智識份子，作爲剝削的對象，豈不是增加政治的離心力？更由於法治未能建立，增設機關，擴大開支，無人能問，造成大量的政治浪費。在現在更聽不到戰時的「政治節約」的呼聲了。從中央到地方，一連串的駢枝機關，狂熱地競賽來浪費人力財力，這對政治實際問題有什麼用處？

所以研究中國政治現象的人們，常常說中國的政治弊病多不勝舉，可都是互爲因果，因之政治責任也難判定。但總結起來，還是一個毛病，就是人民不能而且不願過問公共事務，眞正用人用錢的大權，不在民意機關手裏。法令無威權，玩政治的人肆無忌憚，才弄到今天的地步。愈是相信自己，愈不能接受革新，這樣發展下去，即使沒有敵黨，沒有外患，其結果也要不堪設想，這是每一個忠愛國家的人，所要流涕太息的！

我們默察世界大勢，理性總要抬頭，戰爭的喧嘩，在最近將會壓下，國際的矛盾，也會相對地調和。爲什麼？現在世界大局的關鍵，操在美國，這個國家是個洪爐大冶，各種力量，各種思想，各種人物都有，而且都能過問公共事務。雖然是「紐約六十家」金融資本在操縱，但畢竟不能奴役人民，宰割人民。戰爭的恐怖，侵襲着每一個美國人的家庭。國際的局勢又並未到了珍珠港的前夕。由於戰爭帶來的物價、通貨、房屋等災害，是經常刺激着美國人民的，他們雖然厭惡侵略，厭惡共產主義，可是他們絕不會同情戰爭。對政黨和當權人物的選擇，自有他們的尺度。因此政府的當局和政黨，也不敢採取與人民願望過分違背的政策，對國際便也不會採取一面倒的作風，眞如職業軍人所鼓吹的一樣。對某一類國家閃擊，只要對方不動手，事態也不會鹵莽決裂。如果我們眞相信美國會爲人家「從火中取栗子」，那就太天眞了。假使我們的論斷不會過後錯誤，則現在的國際的糾紛，只是一些幻象，其本質還是趨向和平的。在最近幾年，也許各國會走到更民主的道路，這就是說中間勢力會更發生作用，不致於極度右傾或左傾。蘇聯是安全感特別敏銳的國家，同時現實的作風，常使人家不能忍受。但戰爭的創傷，經濟的困有條件，拖住她不能也不肯採取東條或希墨的路線。備戰的呼聲愈高，求和的願望愈濃，我們覷破了這種關節，爲什麼不團結內部，安定民生？以廣土衆民的本錢，爲國際矛盾關係作調節器？而却要傾向那一方面，或者各自倚靠一方面，以國內的紛爭，做國際的導火線？人雖至愚，何至於此？然而如所周知，當前現狀，却並沒有顧慮此點，忽視中間的力量，忽視人民的公共意思，有如開着輪船向死海裏去，豈非「刼數」！

現在我提供我個人的幾點想法，作爲一個良善人民的建議：在政治的大方向上，我覺得有兩點應該注意，其一是如何樹立人性政治。所謂人性的培養，必須使一般人民有自由的思想，有獨立的意思來判斷是非，來替自身利害說話。這點不獨祈求政府如此地做，也希望無黨區域內更如此地做。拉夫式的開會，魔術催眠似的宣傳，強迫同意的決議討論，那不是尊重人民自由。

其二是防止國際戰爭。中國假如不能遏止世界戰爭，但也決不該做世界戰爭的爆炸器，因此我建議政治談判中，應該特別商量如何防止戰爭的方案，（印度尼赫魯登台後，堅持地要求英軍撤退，同時却不理蘇聯，眞是豪傑之士！）在國際紛紜矛盾中，我們眞有可以獨立自尊的條件，舍棄了這種機會，兩三年後，便無法挽救了！

我們能把握住這兩點，不論政府與共黨協商能否成功，只有一方面肯朝着這方面做，皆可以贏得人民的擁護！

次之是政治的方法。假如談判竟不能成功，戰爭還是延續下去，在兩個統治區內，也應該注意到：一，尊重不同區域，不同經濟，不同文化條件的人民的需要，不要硬性地推行某種制度。在公共事務上，應該予人民以較大的權利。歐洲許多國家的地方自治制度，正是胚胎或完成於戰爭期間。假如地方切身利害的事件，人民也不能過問，替他硬定一套辦法，强之曰「自治」，强之曰「民主」，只能更燃起不滿者的怒火，並非明智之舉。二，建立效率政府，這裏不僅指着現在，而且指着正要到來的政治情況，無論政局形態如何，但如果眞要解決國家大事，必須是建立一個有效率，有辦法的政府。像政黨分贓制的美國的過去政治，決不希望重演於今天的中國，如所周知，今天的政治現狀是存在着若干浪費，廢弛的事實，同樣地共黨區域內幼稚無能的管理，和偏頗的階級性產生的各級政治人員，也何嘗不令人民啼笑皆非？整個的中國，是沉浸在「不學無術」的慨嘆之下，我眞担心着即使無戰爭，也不知如何來着手建國！

雙十節日於南京慶祝國慶聲中

美國教師的貧困

梁甌第

「觀察」一卷三期載楊西孟先生作「九年來昆明大學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實值」一文，列舉生活費指數、薪津約數、薪津實值三項材料對比；一個戰前月入三百元以上的大學教授，列了三十二年下半年，薪津實值只等於戰前法幣八元，削減了原待遇百分之九十八。這一眞憑實據的生動數字，確是文化之羞，國家之辱。

最近我搜集得一些關於呼籲的美國教師應改善待遇的材料，很可以作我國的借鏡與參考。在一九四五年十月號「美國教育協會雜誌」中，有一位作者曾以「教師待遇——國家的羞恥」爲題，提供若干的事實與統計。作者 Robert Littell 說：在美國今日，有一萬間教室沒有教師任教，許多學校因爲師荒的緣故，只能半日上課。Alabama 的一位議員控訴說，他的兒子在中學讀書，一個學期換了五個數學教員，七個化學教員，一句流行的口號說：教師不是一種職業，只是一種副業。同時，唸師範的人大大地減少了，在珍珠港事變以前， Kansas 州師範學院一次會核准六二二人給予學位及文憑， 到「九四四年却只有一一八人了。理由是很顯明的，在 Kansas 州一萬七千五百教師中，年俸在一千二百元以下者只有半數，年俸在六百元以下者却有二千六百二十五人，這樣他們怎樣能維持合理的生活呢？所以無怪乎做母親的人不許她的小姐進師範，做教師了。她們說：與其去教書，毋甯去耕田！

美國密士失必河西 Kentucky 州的 Kevil 城一個小學教師 C.B. Rollins 先生，爲了維持生活的緣故，不得不在夏季出賣了他的林產。去年他辭了職，改行幹街車的司機，收入增加，生活也陡地好過了。 Wickliffe 城的洗衣婦人平均年入六二二元，但學校教師呢，只能得到五三六元，還是曾經修過大學學分的先生底年金呢！最可笑的，許多老師的收入竟不及他的學生。在南 Omaha，Mary Ann Steele夫人是一位女學士，她的教課薪金是每週三十元錢，可是她的一個學生才十五歲，只要每日抽一部份時間幹包裝的工作，每週便可以得到三十五元錢。中學生在晚上調製梳打水，他的收入便和小學教師一樣，這些事實都說明着，美國教師也成了不可爲的職業。「教師不是職業是專業」的漂亮話已經叫不響了。新 Jersey 城的家具商人交代商店夥計的一句箴銘說：「不要花費太多的時間來對待教師，因爲他們沒有錢來符合你們的希望。」

美國小學教師的薪金，自一九二九至一九四五的十七年中，由一三九二元雖已增至一七八六元，但如與同年產業界的工人工資比較，可得如下的統計：

年別	教師薪金	工人工資
一九二九	一三九〇	一四〇八
一九三〇	一四二〇	一三六一
一九三一	一四四〇	一二五九
一九三二	一四一七	一〇八六
一九三三	一三一六	一〇一九
一九三四	一二二七	一〇七六
一九三五	一二四四	一一二七
一九三六	一二八三	一一八一
一九三七	一三二七	一二五四
一九三八	一三七四	一二一六
一九三九	一四〇八	一二五五
一九四〇	一四四一	一二九七
一九四一	一四七〇	一四六二
一九四二	一五〇七	一七三三
一九四三	一五九九	二〇二六
一九四四	一六九三	

一九四五	一七八六

由上表，我們可以看出在一九四一年以前，工人工資是不及敎師薪金的，但一九四二年起，起了很大的變化，一九四三年工資比年薪增高了四二七元，今日的情形自更不止此數。

另外的一種統計，包括着薪金數和薪金實値兩項，所指示出來敎員、校長、學監與製造業、轉運業、礦業工人兩者收入的差異，更爲判然：

年別	薪金收入 敎師	薪金收入 工人	薪金實値 敎師	薪金實値 工人
一九三〇	一四二〇	一一七三	一二一〇	九八二
一九三一	一四二〇	九七〇	一二九三	八九二
一九三二	一四一七	七一八	一四〇六	七三六
一九三三	一二六二	六八九	一三五〇	七四六
一九三四	一一九〇	七九五	一二四六	八三一
一九三五	一二二四	八七五	一二五八	八八九
一九三六	一二七〇	九七〇	一二九三	九七八
一九三七	一三一五	一〇七〇	一三二六	一〇四二
一九三八	一三七四	九二五	一三四三	九一八
一九三九	一三九三	一〇〇七	一三九三	一〇一三
一九四〇	一四四一	一〇九四	一四三二	一〇九一
一九四一	一四六六	一四〇四	一四三二	一三二二
一九四二	一四五八	一八一三	一二八二	一五三〇
一九四三	一五〇二	二一三一	一二三二	一六七〇
一九四四	一六一二	二二五七	一二五九	一七四三
一九四五	一七〇三	二二三八	一二九二	一六八九

從右表我們可以看出，雖然本表與上表的數字有差異，但一九四一年以前工人工資確是低於敎師薪俸，自一九四二年起，工資收入已超出二千元以上，薪俸收入到一九四五年仍只達到一千七百元左右。從購買力的實値來看，一九四五年敎師收入較工人低了四九七元，與上表所指示的，大致吻合。

所以，美國國家敎育協會的手册上呼籲說：一九四〇年至四三年產業工人的工資已經增加百分之五六了，敎師薪俸只增加百分之一一，敎師需要良好的敎養，負更大的責任，當然要比工人的收入好，然而事實上，在一九四四至四五年，敎師的收入至少要比工人低五百元，這對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美國舉行的全美敎育週不啻是一個極大的諷刺。

美國敎育週業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一至十七日舉行，杜魯門總統從白宮發出來的文告也隱約地說及：「在運動週中，我們要切實訪問學校，接觸當前學校急迫的需要與問題。」美國國家敎育雜誌的主編人 Joy Elmer Morgan 却露骨地說：「爭取適當的敎師薪俸，是一個長久困苦幷須向各方面籲訴的戰爭。敎師須知道這是幫助自己的工作，同人的團結統一，將爲戰爭中的主力，而敎師服務的精神，更爲力量統一的表現。」在「敎師薪俸必須增加」一文中，Morgan 主張成立特殊委員會，對於本問題進行工作，大量散發 Robert Littoll「敎師待遇——國家的恥辱」一文，引用全美敎育協會手册指導書及全美敎育週材料，將師荒及待遇低劣情形公諸輿論，以促起社會的注意，幷徵集地方及聯邦政府的基金，以安定敎師的生活。最後 Morgan 說：「一個國家的幸福須求之於智慧的提高，因此，我們的學校要有優良安定的敎師。如果社會合理地調整了敎師薪俸，也可以說安定了極大部份有知慧及有社會認識的人民了。」

我們從上述的資料中，不難看出美國晚近師荒與敎師待遇不公的情形。這情形在我國所顯示的危機尤爲嚴重。固然，我們不必認爲係我國獨有的險象而十分灰心，同時也不能因爲美國也有如此危機，而沾沾自喜，不加重視。師道不尊，國家之恥，有心人無論中外，都有此論調。我以爲敎育界的同人無妨來一個「認識敎師」的運動，敎育研究者應多做些像楊西孟先生的研究，用活生生的事實和數字，像美國敎育界的呼籲一樣，來引起政府與輿論的注意。同時不要忘記了「求敎不如自敎」，敎師同人需要堅定團結，站在自己的崗位上，來爭取合法的生存權利。像 Morgan 所提倡的用各種的方式，如廣泛的徵集敎師福利基金等，這都是可以做而且必須這樣做的。

本文參考資料

Joy Elmer Morgan: Teachers Salaries Must Be Increased, Journal of the N. E. A. Nov., 1945

Robert Littell: Teachers Pay - A National Disgrace, Reader's Digest, October 1945

Frank K. Shuttleworth: The Dollar and the Real Incomes of Teachers and of Wage Workers, 1890 to 1945 School and Society, August, 1946.

客座記言

陳衡哲

二　西方人『回到宗教去』的意義

客：您好？希望您不會忘記，上次允許我再來領教的話。

主：請先坐下來，再談吧。……當然不會忘記上次的說話，我們不是還要討論那西方人『回到宗教去』的問題嗎？

客：就是這個問題！

主：上次我已經約略說過這『回到宗教去』運動的歷史背景了，現在我們不妨再談一談牠的現社會背景。說到現社會，我們試看一看，無論在中國或是美國，最觸目的現象是些什麼呢？好萊塢的拜腿教條；各種商品廣告後面的性慾激刺與利用；報頭標題的充滿性慾與謀殺；兒童讀物的機器……說不完的。總而言之，這種物質享樂的追求，這個追求速度的加增以及牠的範圍的擴大，無疑的都已成為全世界文化的一個大威脅。這威脅對於有點眼光，有點思想，有點關心人類及文化前途的人士，確是一個大挑戰。在歐美，對於這個挑戰的回答，大抵是『回到宗教去』，雖然非宗教的方案也不是沒有。

客：這不是復古嗎？不也是一種反動嗎？

主：我們當然不能說，這『回到宗教去』的運動沒有反動的因子；我們也不敢說，牠是一種狹義的文化運動，而沒有政治、經濟、及社會的因子在內。這些情形的是否存在，是否反動，是向好的或是壞的方面走去，我們都還不甚清楚，所以目前最好存而不論。今天我們且集中於就事論事的一點，且單從文化與人生的一方面，去估計這個運動的價值，好不好？

客：不過，政治、社會、經濟之類的因子，既是整個文化的成份；那我們在討論文化問題時，又怎能把牠們屏除在外呢？

主：非常高興你提出這個問題。但存而不論並不是屏除在外。我們對於一件事，一個人，在不曾得到直接的認識，或充分的材料之前，最好不下斷語。這是我們對於一切事物與學問所應持的態度。

客：謝謝您。

主：現在且讓我們回到本題來吧。我且問你，你還記得和我們同船來的幾位羅馬教神父嗎？

客：呀，真是記得。我早就想問您，他們怎會那麼年輕呢？他們和我想像中的神父，完全兩樣。

主：你想像中的神父是怎樣的？

客：老朽、昏庸、狹隘、泥古、冥頑不靈、宗教狂！

主：這一羣的青年神父呢？

客：真是太兩樣了：他們是那麼年輕，那麼謙虛，又那麼有學問，有同情。我真沒有想到，一個頑固守舊的宗教，會產生這樣一羣的信徒。假使不是靠了那神父的袍領，我還要以為他們是一羣自由思想的大學生呢！不過，我仍懷疑，他們是不是有點例外！

主：好人當然總有點例外，但這決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我的看法是：由於方才所說的現社會的背景，在羅馬教會中，目下一定有一個革新的運動，而那運動又一定足以吸引一羣有人格、有學問，又有理想的青年。因為這運動雖不免要帶一點復古的嫌疑，但決不應是盲目的復古，牠的目標應是恢復古文中的一點精神價值。至少我希望牠是這樣。

客：精神的價值？牠不應以宗教為限呀！

主：當然不。自從文藝復興及科學興起之後，西方的文化也不以基督教為限了；所以這個恢復古文化精神價值的運動，當然也不會以教會為限——無論是舊教或是新教。

客：但為什麼他們的口號仍是『回到宗教去』呢？

主：這是因為西方人的精神生活，大部份仍是寄託在宗教上面的；所以他們對於現社會摧毀文化的威脅，是仍舊願意在宗教中去找尋回答的。不過，非宗教的看法也不是沒有；因為我

們應該記住，宗教不過是一個象徵，主要的還是那象徵後面的精神。

客：象徵後面的精神？

主：那是一個人的靈魂寄託之點。比如愛因斯坦的對於科學，李白杜甫的對於詩，以及一切藝人哲士，英豪賢聖，對於他們靈魂寄託之點，也都可以說是一種宗教。是不是？

客：我想是的。現在請問，您方才所說的非宗教的看法，我可以知道一個例子嗎？

主：你讀過不果（Charles Peguy）的著作嗎？

客：尚不曾讀過。

主：不果先生是現代法國的一位思想家，他很可以作為現代各種思想代表的一位。在他那篇叫做『人道的告別』的短文中，他曾寫過這麼一段：

自古至今，曾有許多偉大的哲理，為了一些原則而爭執。於是，一切又平息下來。於是，當人道轉背之後，一小羣的流氓，盜故賊，大大小小的奸棍，便上了台。到明天，那個偉大的原則就被發現，已在半夜之中被勒殺了。

這是一個非宗教的看法——雖然不果先生本人是一位虔誠的舊教徒——這個以人道為基本的看法，是我們中國人的一個大啓發，大暗示。全世界的大宗師，以數千年的努力，所造出的一點成績，一點道德的標準，一點人格的價值與尊嚴，一點精神的食糧，現在是遭到被流氓奸棍勒殺的威脅了。這於我們以人道為基礎的文化，是怎樣的一個挑戰呢？

客：由不果先生的觀點看來，那麼，那些專求智識，不修人格的人，也是人道的罪人了。

主：（心中想，這位青年很聰明）很高興聽到你的推論，雖然牠未免還有點籠統。智識本是人生向上的一個工具，牠應該是人格修養的同道伴侶。你方才所說『專求智識』的人，大概是指的那些但知追求技能的人吧；因為真正的智識是不會叫人離開修養的大道的。

客：您說得不錯，我所指的，正是那一羣但知追求技能的人。

主：這樣的人不能算是追求智識者，因為他們不過是智識的奴才，不，他們有時還不過是某種技能的奴才。他們不但不能駕馭智識，而且有時連技能也駕馭不住。他們沒有崇高的理想，沒有人生哲學，沒有藝術或宗教的慰藉與感召，也沒有湛深的學識足以寄託他們的靈魂。他們終日遑遑，在一個狹窄的心胸中，計劃着很可憐的一種膚淺平凡的生活。這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一羣？

客：您說得太好了，這正是我心中想說而說不明白的。

主：你方才的看法是對的，這一種人即使不是人道的罪人，至少也是牠的一個負担。而他們的缺乏人格修養，也可能是使人發生『回到宗教去』感想的一個原因。

客：對於這個情形，以及上面所說的現社會的挑戰，我們中國人的回答應是什麼呢？像您方才所引的不果先生的說話，可以作為一個非宗教的方案嗎？

主：不果先生所給我們的，是一個看法，一點啓發，而不是方案。這方案須由我們自己去尋求。但這已不在『回到宗教去』的問題範圍之內了。

客：這似乎應是值得我們研究的一個問題。

主：一個值得研究的大問題！不過，中國文化的柱石既不是宗教，那麼，我們研究的着眼處，也就不能不離開宗教而去另覓一個角度了。

客：（站起）明天是星期日，我可以再來聽您的談論嗎？

主：（也站起）好的好的。明天這個時候，一定在家等候你。

（本節完）

本刊創刊號三版業已印就，每册定價六百元，欲購從速。

英國貿易訪華團團長
鮑埃斯談中國遠景

和平第一・趕快復員・加速工業化
改良土壤・改良種子・使用機械
農工業比例發展・加緊交通建設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百年的歷史翻開了新頁，我們的百年史上最老的友人英國又以貿易的使團到了中國。這次所坐的並不是一八三五年那隻駛向南海的船Jardine號，而是皇家空軍的蘭開夏式巨型機。海權時代雖未過去，但空權時代却已到來，英國並沒有落伍。

鮑埃斯萊士爵士簽名

在一個招待會上，我們一霎倒成為訪華團的貴賓。團長鮑埃斯．萊士爵士，把他的團員向我們介紹，紡織業的代表，鋼鐵業的代表，非鐵金屬的代表，土木工程專家，普通貿易代表，電氣工業代表，工會的代表，糧商的代表。

「我們到中國，友誼第一，貿易第二，主要是看看中國戰後的需要，以及英國能供給一些什麽。只是英國的生產力沒有恢復，中國方面的訂單，交貨要在兩年以後。」

在華北，討論一批鐵路材料的貿易；在東北，研究大豆如何輸送。八年來的建設，我們一年都消耗得精光，這羣英國人到處嘆息道：

「沒有比和平對中國現況更重要。他們可以復員，可以工業化。」

當中美農業考察團來華北時，他們曾用同樣的口吻來表示對於戰爭的憎恨，有了戰爭，沒有生產。英國人的口吻雖是有些含蓄，但其結論與美國人並沒有兩樣。

鮑埃斯談到這裏，他的眼神透出無限的憂鬱，好像是把這長途的疲倦集中在一起放在心頭上似的。他是一個外國人，一個代表團的團長，他只能說到這個地步。這還不夠露骨的嗎？

英國在中國經營的工業，建築材料有英國水泥公司，有上海祥泰木廠，有秦皇島平板玻璃；肥皂有上海肥皂公司，洋燭有白禮氏的僧帽牌；上海及漢口的油業，南京的蛋業，上海的纖絲，都為英人實際所主持。他們到北方，尤其忘記不了的是開灤公司。

「我沒有到開灤去，我們的團員去過了，說起來對於開灤的管理與行政非常滿意，這眞是中英合作的最好表現，這種合作事業，將要成為今後任何合作的一個榜樣。」

不久的過去，英國在中國的力量是太大了，尤其公共事業方面，以鑾拉投資信託公司，控制上海電氣建設公司及新加坡水道公司。安利洋行經營着上海自來水公司，電報及無線電信託公司，控制着大東電信公司，以海底電信公司為主，與丹麥的大北公司對立；這大東與馬可尼公司都承辦電信借款。這些事業的主人今天已逐漸易主。在北方，日出一萬二千噸煤的開灤，不能不說是英國人目中的大企業了。

「萊士爵士，你自己介紹自己吧。」

「我」，爵士笑了，「格魯士特車輛製造廠董事長，英國運輸業的代表。我們的廠在轟炸中，仍然可以生產火車的。」

鮑埃斯，不，萊士爵士對北方的鐵道是注意的。他一下飛機，約好的第一位客人就是交通部華北區的特派員，今日的平津路局的局長石志仁，他們有過一個長談、其內容不外乎是北方八條鐵路在戰時的破壞與今後的需要。運輸的恢復的前題，仍然是器材的運輸問題，對這個問題，我們沒有方法解決，英國也沒有很好的方法。

英國與中國鐵道的關係很深，最多的是中英公司。直接經營的，只有廣九一段，但間接投資的則有北寧，京滬，滬杭甬，淞滬，寧湘。福公司投資的有道清，華中公司投資的有浦信，寶林公司投資的有沙市興義段，大成公司的器械投資。合資的有英法財團與平漢，英美德法財團與粵漢。除東北以外，英國也是在中國境內擁有鐵路最多的國家，一切貸款以鐵道及其財產為擔保。津浦川厘金，京滬還曾要獻出管理權。一切到今日似成過去，但並非過去，作為運輸業的代表人鮑埃斯，至少他要重溫一下這些歷史，而要有些新的表現。

他最後的結尾對於中國的遠景展望是這樣的：

「我們是希望中國復員，趕快工業化，而且希望很近很近就要實現的。」

「工業化，新的事業來了，新的世紀來了，人民的生活也跟着改善了。」

「農業現代化是最重要的，土壤的改良，種子的改良，機械的使用，使農民的購買力增高，使工業生產有更高的成就。

「中國不應跑得太快，也不應太落後，要注意於重工業及輕工業，工業與農業的適當比例發展。工業跑到前面，沒有農業是不可以的；農業跑到前面，沒有工業，也更苦惱。」

「交通的進步，又是一切問題的基本，中國要進步，就不能不注意於交通，特別是水路的通暢。」

談到今後中英貿易的前途，他說：

「英國人不能保持原有的市場，只有讓給別人了。對於美國，英國的船與生產力是無法追得上的。」

英國人還有一個不願公開說的祕密，就是英國工業化的主力紡織業在最近無法恢復，看到日本在戰敗後的活動，不免觸目驚心。多少紡織機器落伍了，多少工人改業為軍火工人了，而日本工人今日通貨仍能穩定，工資成為遠東最低的代表，每人每日工資一二元，尚不足美金七分。廉價的生產，不僅壓倒英國本土，而且壓倒印度的六百萬磅的輸出。大英帝國沒落了。

當十月底香港小販王永祥被英警毆斃之後，東北的官家報紙上一致吶出了「友誼第一，貿易第二」，不要忘記了自己說過的話吧。對於美國人，各地的汽車撞死不少的人，我們從沒有正式哼一聲。這就是中國的態度。

英國領事館內滿是落葉，我和萊士爵士握手告別，他的手掌倒是滿熱的。並且還好心地這麼說道：

「游罷長江，我們的初步報告書就可以完成了。我們的意見那時可以公開。」

我殷勤地問他們什麼時候歸國，他笑道：

「希望在十二月的第三週趕到家，不要誤了我們的聖誕之夜。」

「今年的聖誕老人」，我說，「放在襪子中的恩物一定比去年多了！」

「希望如此」。

這位貴族破例地大笑了一聲。

（十一月五日）

黃河治本研究團團長
張含英談黃河河政

黃河要治好，尚須五十年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蘭州通信）在九月間，黃河水位繼長增高，在蘭州附近氾濫成災的時候，黃河治本研究團團長張含英博士率領團員六人由河南方面來到了蘭州。

科學研究空氣本來稀薄的蘭垣，因為滔滔黃水的橫衝直撞之勢引起了人們的憂慮，因之對于這與治河有關的研究團體也就發生了興趣，希望他們能診得黃河的根本之病，而貢獻出一個「着手成春」的療法來。

張含英團長是前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是國內的水利專家。他們從南京出發已看過了花園口決口，到過了山西龍門，並要到青海黃河上源視察。九月二日到蘭州，只停了三天便去青海，一直到十月十一日方才折回。此地的兩個學術團體為要將其考察心得公諸于關心河運的蘭垣人士，於是請張博士在十三日舉行公開講演，題目是「黃河利病與九省經濟之盛衰」。

關心治河問題的人顯然是很多的，第一因為黃河把中國害苦了，讀過歷史的人和經過這多年來「黃災」不斷襲擊過神經的人，都想聽聽我們對河究竟有無辦法。第二是美國的T V．A的成功的宣傳和長江的Y V．A的設計，打動了對治河寄以憧憬的人士，所以抱着滿懷熱望的聽講者是頗為踴躍的。

但是聽完退出會場，心情却像鉛塊一樣的沉重，因為問題是並不簡單。

中國的事，一切都要歸根于中國的政治，政治無辦法，便一切無辦法。治河工作之毫無進步，不過僅只其中之一端。張博士坦白的說明，在滿清，治河是作官人發財的肥缺，所謂「廣州的洋務，揚州的鹽務，開封的河務，」都是人人盼望得到的差使。到了民國，這三十五年，在政治的紛擾情況中，政府對于治河工作的看法，實在是十分的冷淡。

「最不能克服的困難，便是限于經費太少，自陝縣以迄入海千餘里，到處有破缺，到處要出險，只能年年的頭痛醫頭，脚痛醫脚，不能來一個一勞永逸，原因是經費太少，辦不了事。」

「有人問，何不令沿河兩岸人民自行籌款根治？要知道，貧困的河區人民的生活，非身歷其境者夾雜想象，他們那能有一文錢！」

「要治河，只有兩個原則：上流興利，下流除弊。首先，須明白黃河的性格，與長江是迥然不同的。」

「第一是氣質太暴躁，第二是含沙量太多，一切禍害都是由此而來。河在蘭州附近，流速不過爲五六千秒立方公尺，一到河南，洶湧急流，到達三萬秒立方公尺。而經過西北黃土層，挾大量泥沙以俱下，到河南其含沙量竟達百分之四十八，差不多是半水半泥，沉澱淤積，多麼可怕！」

因之，「治本團」在視察之後，提出的治本方法就是「築壩」，設置大水閘，調節水量，免除下游的氾濫。

「河在陝縣以下孟津以上有一長達八里之窄狹地段，名爲八里胡同者，可設計一壩，高一百三十公尺，使之一直至灌關，儲水似一湖，最上十呎之水使流瀉，餘一百二十呎之水可用以發電約一百二十萬馬力。此壩築成，則可減少下游水速至一萬秒立方公尺。不過只二十年，此壩將逐漸減退其作用，於是而有第二壩之修築。」

「在龍門附近之石門，築壩高約七八十呎，可發電得八十五萬匹馬力，此壩對于八里胡同一壩之壽命之延長，當然大有幫助。」

「此兩壩如此大量的電力，自然不是附近地區所需用得了的，於是可利用以爲吸水至較高地面灌溉之用，則兩岸土地，可盡變爲肥田沃野。」

不僅此也，他們去青海貴德縣上游之龍年峽，循化上游之公伯峽，兩處皆河面狹窄，可擇一處爲水力發電設置，約可得十萬馬力，對于上源人民，這自然是一個厚賜。

以上所言，自爲計畫中之犖犖大者，全盤計劃尙須在全程完全看畢後提出，所以他們又于十五日乘坐大羊皮筏，順流而下去寧夏綏遠。

那麼以上所言種種，何時才可逐一實現呢？這是人們所關切盼望的，也是張博士所望其早日着手的，因爲爲了治河，爲了國家的體面，他曾受過很大的刺激：

他前年去美致察，美國人引他航行在密西西比河上，這水量流速皆大於黃河，過去也應屢氾濫，現在則是兩岸平疇綠野，工廠林立：美國人問他：「你們的黃河呢？有沒有辦法治好。」一句話使他面紅耳熱，半響作不得聲。

所以我們也要問：「黃河何時才能治好？」張博士臨行寄語：「要黃河治好，最少尙要五十年！」五十年！半個世紀！人們怎能心情不沉重，失望怎能不浮上眉梢呢！

這個「天下黃河富一套」之外，無舟楫之利，無灌溉之利，反而時時吞噬人民生命財產的大河流，嗜戰者尙須利用之以爲兵爭的工具，決堤放水以荼毒吾民。「黃禍」或「中國之患」的名詞，實是中國之羞。關心治河者對「貢黃河」的赴美攷察的馮玉祥將軍，也頗寄以企望的，看他回來是否有辦法。但如國家仍不得安定，政治仍不入正軌，國民仍不爭氣，則他雖有滿懷抱負，恐仍將是一籌莫展。（十月三十日）

（上接二十三頁）各種毛病。我們要做效傳敎士的態度，本着實踐的精神，糾正過去的錯誤，改爲合理的生活。我們努力的目標是：（一）知恥，（二）犧牲，（三）奮鬥，（四）愛群。我既是敎師，就本着上列四項做起，希望別位同道亦這樣做。二十年後亦許我國還可以改個樣子。讀者有何卓見，敬請拜嘉！

于鶴年　十月卅一日於天津

紐約來鴻

編者先生：在國外得讀『觀察』數期，具見先生苦心毅力，期爲言論界佔一個有意義的立場，期爲青年們標一個正確的指路燈，不勝欽佩感荷之至。因郵遞遲慢，莊所見之貴刊，倘只有一、二、四、三期，希望能繼續看到以後各期。莊爲一青年苦學生，無黨無派，雖未獲識荊，近曾從前輩中聞知先生刻苦努力之情形，故敢奉書，願托於忘年朋友之列，先生倘許我乎？

莊對於貴刊的創刊辭，完全同意；對於若干論文，亦屬大半贊成；但在所見之數期貴刊中，亦有數點不大以爲然者，可否本『貴備賢者』之義，略貢愚見如下？（所評均限於字眼，後學小子不敢忘評各位作者的意見，非捨大求小也）

一，陳友松先生大作中（第三期），時用『德謨克拉西』，『薩威淩帖』等字眼。莊意，凡中國有此意義之字與名辭，最好不再用譯名。不知尊見以爲如何？

二，楊剛先生大作中（第四期），提及孫夫人廣播時，有『孫夫人一紙宣言觸動了奴氣』之語。據莊所知，不贊成孫夫人之宣言的美國人，亦非盡屬頑固昏庸者，更說不上『奴氣』。莊無黨無派，對於孫夫人之宣言，亦向持『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態度，故對於楊先生之批評，亦不願表示反對。（附帶要說的是：楊先生的文章，也是頗値得一讀的，可惜用了『奴氣』一語，反把全文的身份降低了。）但貴刊既居於領導文化之地位，雖執筆者意見不好各異，但至少對於措辭應有大報的身份。『奴氣』二字不但近乎感情用事，而且亦非貴刊所應採用之語調。以後尙希多多注意，讀者幸甚。

所欲言者，不止此兩點，今且以此兩點爲限。如不見罪，仍當隨時奉告拙見，俾知一部份讀者之反響，以比於『他山之石』，不知能蒙採納否？敬祝成功！

田莊拜上

十一月二日於紐約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福哉馬利亞」

戴鎦齡

一種音調，哀愁震顫的音調，「福哉馬利亞……」（"Ave Maria……"），我永遠不能忘卻，它在我的腦子裏縈繞，在我的腦子裏迴盪，甚至不分日夜刺激着我的神經的每條纖維，使我陷入一種莫名的憂鬱和悵望。

唱那音調的是約翰·馬科莫克（John Mc Cormack），馳名世界的男高音。他還綴而纏綿地吐出斯谷脫（Sir Walter Scott）的詩句，恰似將死的黃鵠的一縷嗚嗚，雄渾、深摯、沉痛，當時周圍空氣中每個波動全給用淚點組成。聽來他唱得那樣輾轉掙扎，不是因爲老了——年紀不過五十剛出頭——他受不住鬱積於中的情感的壓迫，在努力爲自己靈魂的解放而呼號。

他雖早已入了美國籍，但生在愛爾蘭。這等於說，他來自一個迷信和神秘接合的鄉原，一個夢想和虛幻交流的世界；那兒，巴特里克（St. Patrick），一千幾百年前講道說法的基督聖徒，一千幾百年後依然天天顯示靈佑。他不是愛爾蘭島上塞爾特族（Celt）的後裔麼？這民族的過去歷史又是令人傷心的：在異國境內的放逐，在大海洋中的漂流，政治上不得自主，經濟上橫受宰割。他們追念這些慘痛的往事，甚至不輕易笑；有時微微笑容的下層，掛耀着幾顆透明的珠滴。總之，他們不會充分嘗試過人世所謂「快樂」的滋味，這分明是不列顛羣島最溺於感情的一批人。在他們間十八世紀一位詩人及散文家所寫的「威克斐牧師」（"The Vicar of Wakefield"），柔軟了德國哲人哥德的心腸，激起歐洲大陸文藝上浪漫潮流的水花。這使我們聯想起和「威克斐牧師」作者同時的一個愛爾蘭人，柏克（Edmund Burke），他恰是當日英國國會中最情感奔放想像豐富的雄辯家。

當我們走近都伯林大學（Dublin University）門前，瞻着分峙左右的兩尊造像，哥德斯密（Oliver Goldsmith）和柏克，會覺得這是愛爾蘭人特殊稟賦的不可磨滅的標記。是的，造成大英國的偉大的固然多半由於英格蘭人的毅力和意志，而塞爾特民族血統對於英國的藝術、詩歌、和理智文明有過重要的貢獻。莎士比亞的故鄉據說即是條頓人和塞爾特人長久衝突的所在地之一。塞爾特人神經纖銳，工愁善感，多陰柔氣，而且趣味精緻，愛好新鮮的色彩及和悅的音調——不像大多數英國人呆板平實，崇尚功利。我因爲約翰·馬科莫克而想起他的民族的種種了。

他的歌聲令聽的人特別地受感動，並表達那民族的特殊天才和情操，在藝術成就上將和他們的中世紀彫刻和近代詩歌戲劇同垂不朽。酒後耳熱，烏烏悲鳴起來，彷彿是多數愛爾蘭人的天性，不問他是吞姆·穆耳（Thomas Moore），但會拜倫座旁時常哼一串鄉曲；或是詹姆士·喬埃士（James Joyce），他在潦倒的旅途往往咽出幾句慷慨悲壯的絕響。甚至夏芝（W. B. Yeats）讀詩時也極其宛轉悱惻，確是近代英國文壇最講究也最擅長讀詩的人。愛爾蘭是樂曲之邦，那裏，隨處可以聽到懷慨的空幻神異的浩歌。

這樣的樂曲無疑地能滿足我們內心的需要。因爲自世紀末以來，我們的生活無論在科學、文藝、或社會方面，都傾向於錯綜移變，我們的神經也越發成爲錯綜移變的了。紀律謹嚴的古典音樂已不能和眼前的一切相適應。我們所樂於聽的倒是一個叔曼（Robert Schumann）的開發的音質，一個德普西（C. A. Debussy）的震慄的作風，一個司特勞斯（Richard Strauss）的軋轢的樂調，乃至具有渾朴、玄妙、飄忽、而且酸楚的發洩原始情愫的愛爾蘭土曲——這些才相當於我們心情上喜怒哀樂的自然節奏。和這近代精神相呼應的一種運動便是發動於約翰·馬科莫克故鄉的「塞爾特民族文藝復興」運動，也即是使塞爾特民族的天才和情操蘇醒或是說復活的運動。

論愛爾蘭人最公允而有見地的是十九世的法國學者芮農（Ernest Renan），他曾說過：

愛爾蘭民族的歌唱，聽到結尾就是悲歌。他們的曲調雜有無比的細膩哀痛，好像從天上降落，一滴又一滴注入我們的靈魂，化作另一世界的回憶。它能令心頭起一陣寂寥的慰藉，它是貫澈生命全部感覺的恍忽、沈越、而洋溢的詩情。歷來人們總是愛聽它，聽後會昏然死去，說不出是由於甜蜜，還是由於苦痛。

就我個人的經驗說，是甜蜜和苦痛的混合。至少，我聽了約翰·馬科莫克已八年左右，至今仍停留於奄昏欲死去的回味中，心底深處常湧出一種音調，哀愁震顫的音調，「福哉馬利亞……」……

・讀者投書・

編者前記

我們常常接到讀者投書，苦無適當的地位發表。從這一期起，我們決定將「觀察通信」改用六號字排，騰出一點篇幅來選刊讀者來函。但是我們希望：（一）投書人必須附具眞實姓名及通信地址；（二）來函不要太長，最好在一千字左右；（三）希望提出問題討論，或陳述意見，切勿單在消極方面發洩牢騷或訴述苦痛。我們希望國家好，希望讀者多寫一點可以鼓舞大家勇往直前努力奮鬥的有意義的書信。

台灣與祖國

編者先生：讀貴刊一卷九期通信版所刊「台灣鱗爪」一文，頗有所感。近幾個月來，在京滬一帶報紙的記載中，台灣似乎已成為了一個「獨立國」，就是貴刊所刊「台灣鱗爪」一文，也懷疑台灣是否已經成為了一個「獨立國」，並把台省同胞的疾苦及其對祖國的隔膜歸咎于台省當局的「特殊化」和「門羅政策」。我是貴刊的忠實讀者，願本台灣人民的立場，對此發表意見。

先說陳儀。第一：陳氏剛愎自用是事實。軍人出身，今年六十幾歲了，自信心極強，聲威極盛，事必躬親，民主『風度』自然差一點。但他治事之勤，自奉之儉，就不是中樞某些風度翩翩的新貴們所及得上的了。第二：陳氏受知於蔣主席，不受宋院長的節制是事實。他和蔣主席是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還比蔣主席長兩歲，這種關係是旁人冲不淡的。在陳儀調職的消息傳播最盛的時候，陳氏祇是一笑置之。有一次他在省訓團對學員訓話時說：『主席叫本人來此主持省政，自有他的需要。』何況在行政院例會上通過的省長官公署組織法上，明文規定着他龐大的權限。因此省當局的種種經濟措施，完全和宋院長背道而馳。致使上海市場和台灣市場格格不入，好像成了兩個國家的疆土。

我們現在所要研究的問題，是在台省當局利用龐大的權限，是為非作歹呢？還是富國利民？我們先檢討台省當局的經濟措施，也是「台灣鱗爪」一文中所最非難的一點。

第一，根據民生主義中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之義，規定大規模工廠一律國營或省營，其餘小工廠始標售民營。並設立貿易局和專賣局，推行統制經濟政策。這一措施在原則上是無瑕可擊的。不必論三民主義為我們建國的最高指導原則，且看老牌企業自由主義的英國，自工黨執政後，也開始採用統制經濟政策。民主主義之政治和社會主義之經濟二大標的，乃今日時代潮流所趨。我國中樞當局採行什麼有計劃的自由經濟政策而制定的第一期經建原則，乃是為了遷就現實、爭取時間而開的一段倒車。相反地，台灣的社會條件足夠，為什麼也要跟着開倒車而背棄三民主義呢？如所週知：台灣迄今沒有大地主和資本家，以前全省財富都集中在日本統治者手中，現在被省當局完全接收過來，六轡在握，正是實行民生主義的最好時機，難道此時省當局撤手不管，反而讓省外的所謂民族工業資本家來越俎代庖嗎？在官僚資本猖獗的今日，民族工業資本家也許是和我們小百姓站在一邊的，可是我們不要短視，在人民力量的前面，官僚資本這畸形的東西總有一天要倒下去的，到那時候我們就不敢指望民族資本工業家和小百姓站在一邊了。所以站在我們台灣人民的立場上講，我們是極端擁護這項措施的。我們實在不歡迎省外資本家的『開發』。我們認為反對者祇有兩種人，一種和省外資本家有些瓜葛；一種是戰時在後方看盡了國營事業，專賣機關的黑幕，因而談虎色變。其實政策和管理方法根本是兩回事，我們不能混為一談。

第二，穩定台幣幣值以穩定物價。此點在原則上是不會有人反對的。且看事實，今年上半年度因為財政收入減少，復員支出驟增，物價漲了數十倍，這漲勢幾乎叫小百姓驚駭欲絕。以後從七月份開始，物價開始穩定了，迄今未有什麼大漲跌。九月中正是成效初着的時候，中央宣布調整外匯匯率，省當局自動調整法幣和台幣的匯率，因此開罪了貝總裁是事實，但台灣物價果然因此未受影響也是事實。我們小百姓祇問切身之事，所以對於此項措施也是極端擁護的。「台灣鱗爪」一文中物價不提，却說此舉是自外於中央體系，猶之乎說父母害了時疫，子弟不准隔離，一定也要傳染得了病方算孝子賢孫，否則就是自外於家庭體系。

第三，藉交通工具的控制，減少外貨進口，保護本省工業。這一點是不成其為正式措施的。以後船舶多了，美國貨仍可能大批湧進。但目下市場上美國貨確很少見，即使有也很昂貴，本省工業可趁此時機趕快改良品質（敵人實施殖民地經濟政策的結果，本省工業產品大多為粗製品），將來庶可與外貨相競爭。某些靠美國貨活命的高等華人對此怨不絕口，但在我們小百姓們看來，又是擁護之不暇的。

相反地，對於此等措施，省當局能否實行到底；我們比省外人士更其關心

。例如國營省營事業中是否滲入官僚資本？每年度的財政預算是否合理分配；我們要求中樞主管機構的澈査和監督。我們更希望人民的力量結合起來，透過輿論的力量（於此更歡迎省外輿論的協助）或民意機構，予以嚴密的監督。對於貪官汚吏，直接吮吸我們的血，我們比省外人士更其痛恨。希望輿論界隨時督策當局依法嚴懲，但我們也有足夠的理智，不能把政策和執行二者混爲一談，因枝節而懷疑根本。

和內地各省相較，台灣的確是特殊化的。台灣人民對祖國情形的隔膜及其他文化方面的特殊性，可以敵人五十一年的佔領史爲說明。我們深感省當局的文化工作仍然做得不夠。在經濟方面的特殊化，我們却是引以爲慰的。我們以爲這是『特殊好』，不是『特殊壞』。這是中樞許可的『特殊』，不是自己槍桿子造成的『特殊』，所以無妨『特殊』。至於『門羅主義』『獨立國』等與祖國分庭抗禮的名詞加之於台灣，我們却感到大惑不解，痛心疾首。記得這是一位美國記者在在一篇聳人聽聞的新聞報導中倡用的。他的結論是：台灣民意一致希望獨立，受美國的保護或受日本的保護云云，我們原諒他的荒謬和無知，因爲他是美國人啊！我們中國自己人是自卑感在作祟嗎？也樂用這些動人聽聞的字眼！今日的祖國仍陷在分崩離拆之中，台灣這一塊土重歸祖國版圖，明明毫無問題　舉國滔滔中，就此一片乾淨土，値得我們寄以希望，何忍於再橫加汚蔑呢？

汪留照謹上。十一月十一日於台北

我們需要再來一次「五四運動」

編者先生：現在大多數人都在水深火熱之中，閙得喘不過氣來，而極少數的人却可以爲所欲爲。這種情勢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中國大致類似。上次大戰結束之際，到處聽見「公理戰勝」的歌頌。可是中國却受了最不公平的待遇。由知識階級的不滿，才發動了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直接的收穫就是國民革命的成功。這次對日抗戰首尾凡達十五年之久，爲國家，爲民族，犧牲一切，可說空前，而所得的結果不過是『狗咬尿泡』空歡喜。人民的衣食，國家的體面，比較戰前並沒有好轉，所受强鄰的威脅，恐怕更有過之。我們若是重翻三十年前的歷史，必將感覺現在又到大旱望雲霓的時候了。

中國無論如何是一個戰勝國，而現今所處的地位竟會連戰敗的日本還不如，其中必有重大的原因。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我認爲中國所以一塌糊塗，乃是五四運動以來對於道德忽視的結果。我自己也是五四運動中一個小卒。我祗是在五四運動時代，大家忙於新思想的輸入和外交失敗的呼籲，對於新道德如何養成，也就無法予以充分的注意。抗戰以後，但求勝利，不擇手段，從此紀綱失墜，道德墮落，演成今日見利忘義的局面。

現在是時候了！我們要再來一次「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着重在新知的輸入和普及。我們這次運動要着重在道德的實踐。

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如要分門別類的觀察，除去大多數不識不知向來給旁人做魚肉的老百姓以外，要以教師們爲最有良心，因爲我是一個教師，所以知道得最淸楚。教師們第一肯吃苦。吃苦本是做教師的本份。他們在抗戰前就吃苦，在抗戰中更吃苦，乃至勝利以後仍算是最吃苦最少希望改善生活的人們。第二守紀律。他們自幼卽受訓練，進入社會之後又去訓練別人，守紀律竟演成他們的第二天性，儘管別人有各種方便法門，他們很少有企圖逾越範圍。商人可以囤積，工人可以罷工，公務員至少可以虎虎旁人，揩點油水，唯有教師們的僅有的武器是罷教，可是受罷教直接影響的是第二代國民，因此不敢盡量使用，只能在實在迫不得已的時候做做，等於乞討的舉動而已。第三是有理性。現在的中國已經走到開口便罵，舉手便打的階段，教師們却還保持君子無所爭的風度，偶然牽入糾紛，亦只有捱罵捱打的份，極少遇見一試身手能佔上風的。第四是守本分。教師的生活早已和乞丐相等，或者還不如，依然有人戀戀於此，卽使其人太沒有出息，實在是死狗拉不上牆去，然而既是還在工作，無論是否存有五日京兆的意思，仍舊可以算是守本分的人。那些稍有野心的人早已改就他業了。教師們過着極淸苦的生活，守本分，守紀律，處處講理，担負着教育第二代國民的重責，他們實在是最有良心的人了。我並非是說教師以外的人，沒有良心，社會上無論那一界裏都有良心的人，不過所佔的比率不會像教師們那樣高，上述四種德性可作證明。無論那一界的人恐怕很少願意過教師的生活的。有良心的人是可憐的，因此我願意這次新運動由教師們担負起來。

同志們！不要再等候別人做了。救國家，救民族的勝業，是難收速效費力不易討好的工作，急功好利的人是不肯做的。他們亦未必能做到好處。惟有我們有良心的教師，應該負起改造國民道德的重任！

以前的運動都是倡導者站在一邊講，讓別人來做。我們這次運動要倡導人自己脚踏實地的，做出來給別人看。我們要根絕以往的虛憍之氣，浮誇之習，言行不符，口是心非（下接二十一頁）

A. C. E. C. Belgium

(Ateliers de Constructions Electriques de Charleroi)

General Office:

CHARLEROI, BELGIUM

本廠製造各種膠皮線，鉛皮線，花線，堅性橡皮線、風雨線，紗包線．軍用電話線，并製馬達，電話機，電表，以及其他各種零件，無不應有盡有，如蒙垂顧，不勝歡迎。

比國沙城電器製造工廠

上海總行　四川路一三三號卜內門大廈二樓

電話　一四九八〇

郵政信箱　四七三號

電報掛號　DALCO

中國實業染織漂廠

本廠出品

各色士林布　各色細布　各色光斜　海昌藍布　標準色布

各色斜紋　各色卡旗　各色洋紗　法西襯布　不退色布

廠　址：中正南二路四一〇弄七九號　電話七三四九五

發行所：福建南路四一〇——二號　電話八一八五八

事務所：甯海東路九一號　電話八七〇七九

重慶商業銀行

民國十九年設立

分支行三十餘處

辦理一切銀行業務

上海分行　九江路八十號　電話一六八一二　至四轉接各部

上海辦事處　金陵路一七六號　電話八二七六二　八四九七八

偉林工業社

上海辣斐德路辣斐坊七十號

請用

各種化裝香品

寶貝牌

(BOBBY)

雪花霜　唇膏　頭油　指甲油

電話：七五四五〇　七五三三〇轉

大華火柴公司

榮譽出品

大華牌　採茶牌

五洲牌　紅馬牌

廠址：浦東六里橋

事務所：泗涇路二九號　電話一一七四五

建業銀行

經營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上海分行　上海天津路二〇一號　電報掛號　九七三八　電話　九七一五〇　九二七七四　九二八二一　九四五九三

總管理處　重慶民族路一一七號　電報掛號　六二二八

重慶分行　重慶民族路一一七號　電報掛號　六二二八

成都分行　成都湖廣館街四八號　電報掛號　一〇八三

長沙分行　長沙中正路二四號　電報掛號　七二三〇

敬請定閱諸君注意：

最近郵資加價，本刊每本寄費如左：

1. 平寄　十元
2. 掛號　三百一十元
3. 航平　一百六十元
4. 航掛　四百六十元

訂閱時，請註明寄遞方法！

凡欲更改寄遞方法者，請速來信，並望註明定單號碼！

中宣部審(35)刊新第一三〇九號審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